

同济·汉语文学丛书

周茜 / 著

一
翊
集

词学管窥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IBRAR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IBRARY

1967

同济·汉语文学丛书

周茜 / 著

一
翊
集

词学管窥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舸集:词学管窥/周茜著.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8.1

(同济·汉语文学丛书)

ISBN 978-7-5458-1592-4

I. ①一… II. ①周… III. ①词(文学)-诗词研究-中国 IV. ①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02404 号

责任编辑 杨柏伟 刁雅琳

装帧设计 郇书径

技术编辑 丁 多

· 同济·汉语文学丛书·

一舸集:词学管窥

周茜著

出 版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10.75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58-1592-4/I·413

定 价 40.00 元

《同济·汉语文学丛书》编委会名单

主 编：张 生

编 委：崔 铭 邓 军 刘 强 孙宜学 汤惟杰 应宇力

张 闳 张 念 张屏瑾 周 茜 朱大可 朱静宇

祝宇红 朱崇志 王鸿生 万 燕 王晓渔

执 行：李 弢

《同济·汉语文学丛书》总序

同济大学中文系创立于 1946 年。时名为国立同济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与同期建立的哲学系，外国文学系共同组成文学院，是为上海国立大学中第一个文学院。先后在此任教的有郭绍虞、穆木天、牟润孙、潘伯鹰、蒋大沂、张长弓、王善业、蒋天格、徐中玉、曹融南等先生，可谓大师云集。1949 年 8 月，同济中文系奉新政府之命停办，师生遂并入同城的复旦中文系。直至 2003 年同济中文系方得以恢复。因有前贤筚路蓝缕，薪火相继，得以再聚俊彦，故不数年即在沪上乃至全国再现昔年峥嵘之态。迨至今年，即 2016 年，同济中文系已建系七十周年，复建也十载有余。为此，同济中文系同仁特编辑“同济·汉语文学丛书”，择期陆续出版，既宣己志，亦求友声。

而此套丛书初名“同济中文系学术丛书”，原拟循兄弟院校中文系的成例，以在同济中文系任教的教师的学术著作的出版为主。但在我与人文学院院长孙周兴教授商议时，他力主扩大该丛书的编辑框架，以“同济·汉语文学”总括其名，以从同济百多年来对汉语文学的贡献为题系统梳理和编辑丛书，而不必囿于同济中文系的狭小范围，并且，他进一步提议，这套丛书不仅可收录大家的学术研究著作，亦可收入教师们的文学创作作品，故以“汉语文学”而非“汉语文学研究”为名。对此建议我深以为然，因为若从“汉语文学”的角度考察，同济自 1907 年建校以来，师生们为现代汉语文学的研究和创作作出的贡献与其他历史悠久的大学比起来，虽不至于高山仰止，但也不遑多让。尤其是在汉语文学的创作上，人才辈出，

不绝于缕。从上个世纪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诗人宗白华，二十年代的诗人殷夫，三十年代的诗人冯至、戏剧家杨晦，四十年代的戏剧家陈铨，诗人廖青主、穆木天，五十年代的小说家杨益言等，新世纪以来又有小说家马原等加入，皆可为一时之选。所谓“昭兹来许，绳其祖武”，这套丛书自也应当将其人其作选辑列入。

是为序。

张生

2015年4月27日于同济大学中文系

2016年3月16日改于五角场

目 录

- 1 常州词派与吴文英词的再发现
- 26 白石、梦窗词的异同与晚宋词风的嬗变
- 45 吴文英词的“现代化特色”献疑
——与叶嘉莹先生商榷
- 63 隔江人在雨声中
——海外学者方秀洁的吴文英词研究
- 74 诗与词的异代交响
——李贺、吴文英艺术风格比较
- 88 映梦窗 零乱碧
——吴文英词艺术价值论
- 104 李清照是第一流词人吗?
——由词学史引发的一段思考
- 128 香气氤氲中的苦闷与哀愁
——试论《乐府补题·天香》的艺术及其文化意蕴
- 143 蝉声呜咽中的凄凉与悲苦
——《乐府补题·齐天乐》析论
- 156 朝鲜本朱熹诗文选集《雅诵》考论
- 165 韩国汉学家车柱环的词学研究
- 179 一笔不应当拒绝的遗产
——常州词派“比兴寄托”论词的现代解读

- 197 新世纪以来温庭筠研究述评
- 214 民国初期梅兰芳与沪上词学家交往考述
- 228 清文化遗民与京剧
- 250 一生心事付吟梅
——清季遗民况周颐“咏梅词”论
- 277 “大梅党”赵尊岳与梅兰芳
- 312 清遗民京剧家陈墨香的戏曲人生

常州词派与吴文英词的再发现

—

常州词派以“洞悉本原，直揭三昧”的词学研究用心和以“复古尊体，比兴寄托”的倡导大大地促进了词学的发展，但是他们对词学的探索和贡献不仅仅如此。常州词派之所以能够笼罩词坛上百年之久，不但在于他们以经学眼光、学人之路来严肃认真地研究词学，更以精微的词人之心来作词、选词、论词。他们在创作和理论的求索中始终不断地在自我修正、补充和完善，最终形成了一个内涵丰富，完整自足的理论体系。这一体系除了有着对儒家传统诗学的借鉴和发挥，更有对词学自身审美特质的切身体会和深入研讨，反映了清代中期以来词学家的理论自觉，标志着词学理论批评进入了总结性阶段。前贤时人在常派的尊体、兴寄方面颇多阐发，但他们在对词之美感特质的体认方面鲜有述及。实际上，大力推尊词体，讲求比兴寄托，都是为了反对“词为小道”“词为艳科”的传统观念，力图使词争得与诗平起平坐的地位，就此而言它所要证明的是词与诗的相同之处。但另一方面，也是此前研究者往往忽略不论的方面，就是要探索词与诗的相异之处，探索词与诗不同的艺术规律和审美品格。对于尊体的目的来说，后一方面应该是更为重要的，因为只有确立了词独立于诗的审美品格，才能最终确立词在抒情文学中“别是一家”的牢不可破的地位。

众所周知，词体文学在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后，在宋代达到

了巅峰，从而成为了一代文学的象征。词缘情婉雅的意蕴内涵，体小质轻、言长境深的体性特点，含蓄柔媚、要眇宜修的美感特质也被规范定型。与此同时，也向我们昭示了词学的两难选择：一是“词”如何摆脱“艳科”“小道”的束缚，赋予它与诗同等的地位；二是在争取获得与诗同等地位的同时又如何保持“词”作为一种特殊的文艺体式自身所应有的美的特质，而不丧失其独立性、本质规定性。虽然，宋词的创作已经达到了极度的辉煌，后人已是盛极难继，但是宋代的词学理论却是相对滞后的，它既否定词体的改革，又找不到新的出路，未能解决这始终纠缠一体的难题。而元、明词学整体衰微，于是，词学研究的任务留给了复兴的清代。

词体之尊，清初已肇其端，如阳羨词派、浙西词派等均不同程度地表达过尊体的主张，但这并非他们论词的主旨，更未形成完整的词学理论。清代中期，常州词派兴，他们在总结前人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将保持词的特殊体式、审美特质与提高词的精神品格二者结合起来。当然，他们的探索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过程。从张惠言、周济的寄托说，到谭献的柔厚说，陈廷焯的沉郁说，最终至况周颐的重、拙、大说，形成了前后相续的理论系统。不过，本文采用的方法不是单纯的理论上的追踪。中国古代诗学与西方理论的一个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并不定义一个普遍的本质的概念，追求一种逻辑的推理的方法，而往往是直寻的、吉光片羽式的感悟，尤其擅长通过对具体作家作品的品评来展示其审美理想，因而本文拟从一个新的角度，即从著名词人吴文英词作的再发现，来揭示其美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同时，也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吴文英词的艺术价值和历史地位。

二

词学史上，吴文英（字君特，号梦窗）是最有争议的一位词家，同时，又是最有艺术独创性的词家之一。他于传统的婉约、豪放之外，另立密丽之体。其词艺上的戛戛独造、意深旨远，使他的出现成为宋词最后一抹绚烂的夕阳晚照。然而，由于材料匮乏，吴文英的词作又幽邃艰深、骤难索解，因此，对其人其词的认识和评价十分悬殊，七百年来，其历史地位的跌宕起伏之剧在两宋词人中实属罕见。南宋末年至元初，沈义父的《乐府指迷》、张炎《词源》都对梦窗词有所评述，吴文英已声名鹊起。元、明两朝梦窗词却湮没无闻。有清一代，号称词的中兴时期，作家众多，词派纷呈，梦窗词则与常州词派结下了不解之缘。随着常州词派的演进发展，梦窗词亦渐行渐盛。自周济推吴文英为领袖一代的大家始，继之晚清王鹏运、朱祖谋、郑文焯、况周颐四大家的钩稽考订，推波助澜，梦窗词的辉煌达到了顶峰，以至于“近世学梦窗者几半天下”（吴梅《乐府指迷笺释序》）。

吴文英词在晚清被推至巅峰，但常州词派对其词作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与常州词派理论的发展进程是一致的，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常州词派的初期。

嘉庆二年（1797），张惠言与其弟张琦编辑《词选》，该选本及《词选序》鲜明地体现了张氏的词学观，因此，张惠言被常州派后学追尊为祖师。张氏对当时在词坛仍然有着相当影响的浙西词派具有的“意旨枯寂”“琐屑”“寒乞”之病深为不满，故推尊词体，倡导“意内言外”“风雅比兴”的“寄托说”，并且用索隐、比附的解经法重新解释唐宋词，以求阐发微言大义。《词选》录唐五代宋词四十四家一百一十六首，吴文英词却一首未录。张氏曰：

宋之词家，号为极盛。然张先、苏轼、秦观、周邦彦、辛弃疾、姜夔、王沂孙、张炎，渊渊乎文有其质焉。其荡而不反，傲而不理，枝而不物。柳永、黄庭坚、刘过、吴文英之伦，亦各引一端，以取重于当世。〔1〕

张氏认为吴文英词“枝而不物”，与“荡而不反，傲而不理”的柳永、黄庭坚、刘过辈同列，故不取。张惠言《词选》去取过严，其传人董毅再编《续词选》，录五十二家一百二十二首，选梦窗词两首。虽然《续词选》增补两首，但相较于梦窗三百四十余首的词作数量以及所采录少游、清真、白石、玉田等人的数量，实在是微不足道。由此可见，吴文英词在常州词派的初始阶段是被漠视的对象，其声名不彰。

在理论方面张惠言所倡导的“寄托”，主要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以政治比附说词。此点，以往研究者所论在在皆是，故不赘述；二是提倡幽微深隐。张氏承认词是“缘情”而发的，并通过“微言”以达到感染的作用。其曰：

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诽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2〕

就此论者多拈出“微言”“贤人君子”来说明作为经学家的张惠言强调的是儒家道之义理的微言，这只看到了问题的一方面。叶嘉莹先生认为：“其所使用的‘微言’二字，就恰好表现了一种双

〔1〕 张惠言：《词选序》，《词话丛编》（唐圭璋编，中华书局1986年1月第一版。后文所引《词话丛编》皆与此同，故只注明册数、页码）第二册，第1617页。

〔2〕 张惠言：《词选序》，《词话丛编》第二册，第1617页。

重性的微妙作用，既可指道之义理的‘微言’，也可以指词之美感的‘微言’。”^[1]叶先生所言极是。在此我们不应忽略张氏之“幽约怨诽”“低徊要眇”等语。作为抒情作品的词，与诗文相异，其语言、其意境、其形式都应该是精微要眇富于深隐幽微之意蕴的，这也是张惠言论词的出发点。而具有幽微深隐之思想意蕴和审美意蕴的词作，其文本便呈现出多层次性，内涵的丰富性和表达的隐微曲折。在常州词派后续的理论发展中，张惠言寄托说的两方面都有发展变化，前者比附索隐的层面逐渐淡化，后者对词体本质特征的认识则进一步深化。

吴文英词历来以深微幽隐著称，因此，张惠言不赏吴文英，原因主要在于“寄托”说的第一方面。在词之创作的初、中期阶段，如温庭筠等人的词作，所抒之情多是客观抽象的，女子的相思别怨也都是一种普泛化的情感，易于引发人们爱情以外的联想。再者，他们所采用的也多是一种公共的文化符码，如美人香草、蛾眉红粉之类，这些已成为“语码”的象征符号积淀着某种普遍的、深沉的文化意义，为政治比附说词提供了较大的空间。而吴文英词的情感表达与温庭筠等完全不同，主要是个人之情的真切感受，且采用得更多的是一种私人的符码，如“愁鱼”“酸风”“兰泚”等，因而缺乏说词的抽象性，较难从中发现政治教化之寄托，故不为张氏所取。然而，张氏虽不取梦窗，但他看重词的“意内言外”之意，“幽约怨诽”之情、“低徊要眇”之致，无疑为此后常派发掘梦窗词提供了契机。

第二，常州词派的中期。

常派的真正确立并最终能够在词坛获得巨大成功得力于周济对

[1] 叶嘉莹：《说张惠言〈水调歌头〉五首》，《清词丛论》，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14页。

张氏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其词学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寄托出入说”和“浑化”的最高评词境界。

初学词求有寄托，有寄托则表里相宣，斐然成章。既成格调求无寄托，无寄托则指事类情，仁者见仁，知者见知。〔1〕

夫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一物一事，引而申之，触类多通。驱心若游丝之飞英，含毫如郢斤之斲蝇翼，以无厚入有间。〔2〕

“有寄托”即创作主体将内心特定的情感和情绪通过对“一物一事”的刻画描摹具体入微地表现出来。“无寄托”则是创作主体的主观情思受外界物境的触发，并与物境交融为一体，构成主客相契、妙合无垠的艺术境界。这种“无寄托”的寄托不是作者有意为之，而是其表达的思想感情自然而然地流露。由于作者未留下有意寄托的痕迹，似有寄托似无寄托，因而这类作品更具有丰富深邃的意蕴，也更难测其端倪。

此外，对于寄托的内涵，周济有着更合理、更开阔的见解：

感慨所寄，不过盛衰，或绸缪未雨，或太息厝薪，或己溺己饥，或独清独醒，随其人之性情学问境地，莫不有由衷之言。〔3〕

周济认为社会人生的盛衰治乱都是词人寄慨的现实依据，词人

〔1〕 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下称《杂著》），《词话丛编》第二册，第1630页。

〔2〕 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下称《序论》），《词话丛编》第二册，第1643页。

〔3〕 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词话丛编》第二册，第1643页。

的性情学问、遭际境地各不相同，对社会人生的认识感慨自然也不相同，但只要是身处其境的感受莫不是由衷之言，莫不是作家创作之所寄。

可见，周济“比兴寄托”理论淡化了张惠言的政治伦理色彩，更加圆通地扩展到了现实人生的领域和艺术审美的境界上。因而，对于梦窗词，《杂著》曰：

梦窗非无生涩处，总胜空滑。况其佳者，天光云影，摇荡绿波；抚玩无斁，追寻已远。君特意思甚感慨，而寄情闲散，使人不测其中之所有。^[1]

被张惠言指斥的梦窗词，周济则给予了高度评价。因为梦窗词的“抚玩无斁，追寻已远”“使人不测其中之所有”，正是切合其“寄托出入说”之“无寄托出”的高境的。

在其晚年的《宋四家词选》中，周济更是把梦窗词提升到了“领袖一代”的四大家之列，吴词地位骤然攀升。其曰：

清真集大成者也。稼轩敛雄心抗高调，变温婉成悲凉。碧山灰心切理，言近指远，声容调度，一一可循。梦窗奇思壮彩，腾天潜渊，返南宋之清泚，为北宋之秣摯。是为四家，领袖一代，余子荦荦，以主附庸。^[2]

《宋四家词选》旨在为初学者指示一条切实可循的学词途径：“问途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序论》）。于此，两

[1] 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词话丛编》第二册，第1633页。

[2] 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词话丛编》第二册，第1630页。

宋词被分为了周、辛、吴、王四大家，其余数十家就其风格相近者，分隶于各自麾下。其中周词选二十六首，辛词选二十三首，吴词选二十一首，王词选十八首，吴文英词的大家地位就此被周济确立。此后词坛风气转移，逐步掀起了学习梦窗词的热潮。

总之，周济的“寄托出入说”是一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理论，此寄托不是概念，不能确指，更不能如张惠言般强为比附，拘执不化。它不但扩大了寄托的思想情感内涵，也有着艺术审美的要求。吴文英词以抒写闺帷儿女，伤春怨别为主，其中也寄寓着作者的身世之感，家国之思，而其艺术手法变幻莫测，常常含糊其词，隐约其旨，正在于有寄托无寄托之间。周济对吴文英词评价的重大转变，原因正在于此。

此外，清代词坛各家各派开宗明派必指示方法与途径。南宋词之技巧可学，北宋词之高浑难追，梦窗词千锤百炼、技巧纯熟，其使事用典，炼字炼句，皆脉络井井，有法可循，就后学言，不失为极佳的学词门径。这也是周济推举吴文英的又一原因。

尽管周济赋予吴文英领袖之一的地位，但周济反对浙派推宗南宋，他的审美理想是北宋的自然高浑，其树立的最高典范是周邦彦的浑化无迹。只是北宋词之自然高浑，无从步趋，不如南宋词有途可循，可供模仿。因此，其最终目的是要由南宋返北宋，而吴文英只是一个必经的阶段，并不能代表词的最高境界。尽管如此，梦窗词在周济处的转折却是关键性的。

第三，常州词派的后期。

这一阶段，以陈廷焯和王鹏运、朱祖谋、郑文焯、况周颐晚清四大家为代表，常州词派的词学最终成熟，吴文英也被推举到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

陈廷焯本“风雅比兴”之旨，创“沉郁顿挫”之说，其理论架构完整并能自出机杼，将常州派词论推向了新的高峰。陈氏超越了